

# 马克斯失政前后纪实

〔美〕贝思·戴·罗慕洛 著  
郭 鸿 李 双 周嘉栋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六月

(京)新登字第121号

**马科斯失政前后纪实**

——鲜为人知的秘闻

〔美〕贝思·戴·罗慕洛 著

郭鸿 李双 周嘉栋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60,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7-055-6/I·30 定价：3.80元

##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有关菲律宾马科斯—伊梅尔达王朝兴亡的纪实性作品。作者是美国作家兼记者、已故前菲律宾外交部长和总统顾问罗慕洛的夫人贝思·戴·罗慕洛。她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多年出入菲宫廷，与马科斯夫妇及其家族、菲上层官员及各界知名人士有密切接触，深知内情，且在菲政局动乱中是目击者。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大量事实，记述了马科斯夫妇之间“商业性和政治性”的貌合神离的婚姻，伊梅尔达如何“从一个光着脚丫的农村姑娘，摇身一变成为菲律宾王后”，成为“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她的野心、骄横、奢侈、腐败，以及在“大军压境”和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双双出逃的详细而生动的经过。

作品以第一人称记述，读者如身临其境，颇有意味。对了解菲律宾内幕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 目 录

开场白.....	( 1 )
外交官和政治家.....	( 8 )
一桩涉外事件.....	( 17 )
伊梅尔达和富翁环球游览团.....	( 30 )
我的马尼拉.....	( 48 )
头面人物的正式访问.....	( 61 )
婚姻生活记实.....	( 83 )
野兽——在国内和国外.....	( 93 )
将军竞选公职.....	( 116 )
医院巡回.....	( 130 )
伊梅尔达购置的房地产.....	( 142 )
走下坡路的开始.....	( 151 )
最后一次庆祝.....	( 164 )
阿基诺之谜.....	( 179 )
道义的革命.....	( 192 )
人民与马科斯家族之间的斗争.....	( 208 )
出走.....	( 225 )
结束语.....	( 244 )

## 开 场 白

我最后一次见到伊梅尔达·马科斯是1985年12月15日在我丈夫的葬礼上。遗体告别仪式在教堂旁边的房子里举行，房间很小，里面挤满了人。“第一夫人来了！”“总统来了”！我耳朵里传来了人群中发出的急促的阵阵耳语。伊梅尔达·马科斯先进来，全身黑色，形象突出：黑衣裙，黑袜子，黑皮鞋。总统尾随其后，人群纷纷后退为她让路，最后退到了放置花卉的地方。房子里摆满了花。伊梅尔达端庄而美丽，多年来她的权威从未遇到过挑战，因而她就更象王后一样庄严。

她走到我站立的地方，拥抱了我，用低沉、同情的语调说：“可怜的贝思，你现在孤单一人了，你一定要来跟我住在一起。”

那些听到她这句话的朋友后来跟我开玩笑说：“那你就跟她一起飞往檀香山吧！”后来，两个月不到，她的帝国就崩溃了，她和她丈夫在地球上到处流亡。

我问候了总统，三人走到棺材旁，向我丈夫遗体告别。我丈夫是卡洛斯·罗慕洛将军，任马科斯总统的外交部长达14年之久。在辉煌的一生中，他做过许多工作，当过兵（二次大战中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出版商、作家、教育家

和外交家。他是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人之一，也是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第一位亚洲人。

葬礼前要守灵三天。我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我们教区这座古老而又可爱的西班牙式的圣·安东尼奥教堂里。菲律宾肾脏病治疗中心呼吁来吊唁的人把买花的钱省下来捐献给他们，而我丈夫的许多生前友好既捐献又送花。兰花、安修里厄姆花、玫瑰花等大花篮布满了小教堂，又一直沿着通道排到外面汽车道旁。死者亲人送的一朵朵白兰花，上面写了名字，别在棺木（棺盖开着）里面柔软的衬里上——这是菲律宾的传统。

葬礼那天早晨，我们一家人在马尼拉大主教红衣主教海梅·辛主持下，先在圣·安东尼奥教堂里做了弥撒，再将将军的遗体移至马尼拉美丽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居高临下，俯视着马尼拉湾。国葬就在文化中心举行。总统和马科斯夫人亲临葬礼，内阁和外交使团的全体成员，以及外国专程来参加葬礼的贵宾都参加了。总统代表菲律宾致悼词。亚洲邻国的外长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首脑致悼词。日本一位前外长也讲了话。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曾任驻菲律宾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宣读了里根总统给我的吊唁信，颂扬我丈夫任职达半个世纪中所作的贡献，这是令人十分感动的庄严时刻。罗慕洛将军逝世前两年才退休，是世上年纪最大的外长，任外长的时间仅次于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将军是位国际人物，菲律宾人视为国家的宝贵人才。

瞻仰遗容的那天晚上，我和马科斯总统坐在棺木前。“我想您现在要忙于竞选了！”我问道。“不，”他揉了揉腿说，“膝盖疼痛使我不得安宁，战争留下的老伤罗。”

（他总爱提起他过去打游击的经历）。他朝伊梅尔达点了点头。她已离开我们，在人群中游动——临驾于众人之上，兴奋得眼睛闪闪发光。她有次曾对我说她象条鱼：你把鱼从水中捞出后，鱼眼就渐渐暗淡，失去光泽。如果你把伊梅尔达从人群中拉出来，她也会黯然失色。由于孜孜不倦的努力，她终于成为世上最突出的政界人物之一。

马科斯总统望着棺木，陷入沉思，最后以一种温柔的语调，既是对我又是对他自己说：“他应该当总统的。”

我想起，总统之职30年来从未容人竞选过。但我没有明说，因我知道，他当时想的是那许多次阻碍罗慕洛将军踏上菲律宾总统宝座的“功亏一篑”的情景。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塞尔希奥·奥斯梅尼亞总统邀请他作为他的副总统参加竞选，他谢绝了。那时奥斯梅尼亞政敌曼纽尔·罗克萨斯很得人心，他也邀请罗慕洛做他副手参加竞选，他也谢绝了。罗克萨斯击败了奥斯梅尼亞，但死在总统任期中。1953年，我丈夫的确参加过一次竞选，但很短暂。因他获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拉蒙·马格赛赛，马格赛赛得天独厚。我丈夫为了照顾他，就撤出竞选。此后，时而听到这样说法：如果马科斯政府垮台，需要有个临时政府代替它，那么人民就会推举罗慕洛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等待大选。这个机遇也真的来了，但不幸的是，那时将军已经病得太重，而且也过于年迈了。

伊梅尔达坚持要用她的车把我从英雄公墓送回家。我说我自己有车，有养子护送，但她不容我推辞。“您难道不跟总统一起走吗？”我问道。马科斯看起来身躯矮小，走路病

病歪歪，在我看来那天他突然苍老了。在追悼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颂扬我丈夫的极好的悼词，他显然为那天的情景所感动，读到某个地方我见他流泪了。

“不，他有人陪。”她说。总统独自一人带着警卫员乘车走了。然后她那与众不同的黑色轿车开来，我们一起上了车。我们两人坐在宽敞的后排座上，跟司机和保卫官员之间隔开一道玻璃挡板，后面跟着一辆警卫车。

“你毕竟与众不同，”她惊奇地说。“你甚至没有哭。”

在菲律宾，遗孀要当众嚎啕大哭，甚至与死者亲近的男人也得流泪。有个固执的陆军少校甚至最后一刻仍想打开棺材盖，让我当着参加追悼会的人的面，满眼泪花地说句诀别之言，但我断然拒绝了。他也就不再劝了。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跟大家很不协调，但我丈夫会同意我这种节制态度的，他在世时就不赞成大庭广众之中流露感情。

“我并不感到特别悲哀，”我坦率地对第一夫人说。

“葬礼实在美极了，他的生前友好、同事都来参加了。”

马科斯夫人送给我一个扁平的盒子。我没有当她的面打开，因为那太难为情了。待我回到家里，独自一人时，我才打开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两串黑白小珍珠，一副黑色的大钻石戒指和耳环。戒指两边都镶了宝，一对耳环上也镶了小宝石，特别显眼。穿上黑色或白色丧服，再戴上这副首饰再合适不过了。

她喜欢馈赠漂亮的礼品，真是“慷慨夫人”。她和她丈夫曾互赠价值8千美元的钻石手表，作为圣诞节礼物！葬礼结束后，她每天送我3支玫瑰花，送了30天。我问佣人，3

支玫瑰代表什么，她说这意思是“我爱你”。

爱，伊梅尔达喜欢这个字。马尼拉将成为爱的城市。只是别提城外那些可怕的垃圾堆，捡破烂的人就住在这垃圾堆积如山的地方。一座座简陋小屋被马尼拉高大的白色城墙挡在城外，要不让人看见了就有伤大雅了。她是美和爱的女神。她为自己豪华的衣饰和收藏的珠宝辩解说：“穷人要我成为他们的星星。”此话看来也是真的。她坐上有空调设备的私人“爱情大轿车”到她童年故乡塔克洛班去时，或是视察马尼拉她那特别心爱的项目——菲律宾心脏病治疗中心、儿童医院——时，她打开车窗，探出头来，衣衫褴褛的人群踏着木屐，围着汽车，争着要摸一下她的手，仰起布满皱纹的棕黄色面孔崇拜地看着她，被她美丽的光辉照耀得眼花目眩。

黑色的大轿车缓缓驶进我院内弧形车道。这位第一夫人好奇地眯着眼睛看看我的房子。我们以前住在罗慕洛官邸时，她常去作客。将军辞去政府职务退休以后，我们就搬到这座房子来，她从未过这座小屋。

“您想进来坐一会吗？”我问。

“好的，”她毫不犹豫地说，下了车。仆人们此刻还在公墓，只有厨师来开门。厨师手里牵着一条精力特别旺盛的西班牙长耳狗，这畜生执意要扑向我们所有的人。

她走进屋，兴致颇浓地向四周瞧瞧。我带领她看了整个屋子。其实走的路不多，因为所有东西都在一层楼上：后面是我们的一大间舒适的卧室，房里摆了许多扶手椅；一间是将军的更衣室，室内有理发椅子和运动自行车；还有一间他生前的书室，里面放满了书，他常常在这里接待客人。我想

起不久前迈克尔·迪弗就坐在这里安排里根总统访问马尼拉的事宜——后来访问取消了。

我们坐在阳光充足，没有顶盖的凉台上，面对着长满兰花的花园和游泳池。“你为了使他高兴才把房子收拾成这个样子的，”她说，与其是对我，不如说是对她自己。“现在你想干什么呢？”

“这里乱糟糟的，要好好安排一下。”我开始说，心里想的是我书房里那一千多封唁电、唁信和表示悼念的明信片，我得回复。

“不去纽约吗？”她突然间。她喜爱纽约，我们常常一起去纽约，将军和我住在华道尔夫饭店36层的套间里。自1935年起，将军总是住在这个房间里，而她则住在37层那套麦克阿瑟将军曾经住过的豪华房间。每年秋天联大开幕时我们就去纽约，我丈夫是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马科斯夫人去的理由就数不清了，但主要是去玩。她酷爱纽约的歌剧院、话剧院、餐馆以及夜总会，尤其酷爱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兴奋气氛。她通常带一大帮随行人员，住上几星期或几个月，这要看总统什么时候要她回马尼拉。“纽约是我休息和疗养的地方！”她曾对我解释说。

“啊，我要去的——可能春天去，”我说，“我要看看家里的人，照料一下企业，然后我再回来。”

“你还回来！”她吃惊了，好象我早该离开马尼拉，居然现在还未走。自从深得人心的反对党领袖小贝尼格诺·阿基诺无辜地惨遭暗杀后，菲律宾这两年来的经济、政治形势以及国际威信急趋下降，许多人移居国外，不能到国外当移民的——包括她的那些“蓝色夫人们”<sup>①</sup>（这称号是专给伊

梅尔达圈内的夫人们的），也把金银细软和现金收拾起来跑到香港、纽约、瑞士和摩洛哥去了。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13年，马科斯夫人，”我提醒她说。“这儿有我的家，我的朋友。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

她对我在她的国家里过得如此习惯感到高兴。我们闲谈起过去的时光，谈起我当初成为她的伴侣的情景。“他多么为你得意喲！”她回忆起我与丈夫最初几次拜访马拉卡南宫的情况时，大笑起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几星期后，菲律宾暴发了震撼全国的革命，费迪南德·马科斯拚命抓住他日益衰落的权力不放。

她的一切政治伎俩和魅力都无济于事了。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了。我不禁想起她的朋友江青垮台时，她曾说过的话（她对江青倍加赞扬，曾预言她能经受住中国政府发生的任何变化）：“江青没有把她的位置摆对。”

呜呼，你也没有摆对啊，伊梅尔达。

---

注① “蓝色夫人”是社会名流，马科斯夫妇的支持者。这个名称首次出现于1964年国民党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马科斯获得提名。她们穿着菲律宾妇女的白色民族服装“特诺”，即着蝶式衬子的连衣裙，系上“蓝色马科斯”腰带。马科斯竞选获胜和就职后，她们成了马拉卡南宫的密友，常常帮助伊梅尔达接待来访的贵宾。

——作者注

## 外交官和政治家

我第一次见到马科斯总统是1973年1月，那时他已执政8年——比菲律宾任何一位总统的执政时间都长。1986年他被赶下台时，他整整统治了20年——等于菲律宾独立以后的一半时间。许多年轻人——全国5千6百万人口中，20岁以下的占50%——都不知道有其他总统。

马科斯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二次大战的结果。日本人入侵菲律宾时，他在菲律宾陆军里服役。后来这个岛国被侵占，他逃出俘虏营，跑到他的故乡北伊罗戈省，上山打游击。麦克阿瑟将军解放这个国家时，马科斯进入了政界。1949年马科斯32岁，风华正茂，成为国会里最年轻的议员。到1964年他已一步步爬上了参议议长的宝座，向争取连任的在职总统迪奥斯多·马卡帕加尔提出挑战，首次参加总统竞选。

菲律宾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未发展到两党制的程度：即有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黑白分明的大党。竞选活动是个人之间的较量，候选人转党就象换件衬衫那么随便。选举中总有相当多的贿赂、欺诈行为，领先的候选人用钱把对方挤出去，这几乎是菲律宾选举的特征。由于广大基本选民都是穷苦百姓，所以谁出钱多，获得的选票也多。

另外，也谈不上对政府本身有什么忠贞不渝。菲律宾受西班牙统治长达400年，大家把西班牙视为压迫者；后来美国控制菲律宾达40年，同样，对美国总督也无丝毫好感。菲律宾人希望要的是一个“达图”（菲律宾南部穆斯林贵族的称号——译者），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一位能照管其臣民的领袖。对全国人民这种渴望，没有人比马科斯了解得更深，利用得更好。他把自己打扮成人民所需要的人：坚强，冷静，有点严厉，又有热情奔放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不断为自己塑造一副战争年代英雄的形象，聪明巧妙地散播关于他那非凡勇气和惊人胆识的故事。

马科斯把自己说成是在被日本占领的岁月里“最有献身精神的游击队员”，他风头出足了。他遇到并追求伊梅尔达·罗穆阿尔德斯时已是一位杰出的参议员。伊梅尔达出生于显贵家族，叔父是参议员，但她父母穷困。聪敏而野心勃勃的马科斯参议员结识她时，她正在一家银行工作，也练习唱歌。马科斯认识到，在他夺取政权的宏伟计划中，她是十分理想的搭档。

这俩人是竞选中一对很可怕的混合双打冠军——费迪南德身材匀称，健壮得象运动员似的，黑眼珠闪闪发光，演讲技术特别高超，洋溢着旺盛精力并充满魅力；伊梅尔达一头光亮的黑色秀发，圆圆的西班牙式大眼，女性娇媚的仪态，悦耳的女高音歌喉。一旦被她丈夫推上政治舞台，年轻的伊梅尔达（她比丈夫小11岁）立即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争取选票的好手。她乘上飞机，坐上汽车，搭上“班卡”（菲律宾的独木舟）、渡船，跑遍了菲律宾群岛的许多岛屿，给大家唱歌，把她的丈夫兜售给选民。

他们演出了菲律宾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光辉的政治二重唱，在人群中激起的浪漫的期望和激情，就象年轻的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在美国揭起的激情一样。

马科斯确定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后，就能演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精明的律师，他总能猜透对手的下一步棋。他读了不少书，讲话中常常引用历史和文学著作里的语句。他还给人一种印象：他已强烈地意识到他个人的命运。许多人隔着桌子坐着听他讲话，觉得他说的每句话都很令人信服，包括他对自己非凡勇敢的微妙的暗示。马科斯很能自制，坚毅不拔，自信心很强，是个诡计多端玩弄权术的人，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最能满足人民需要的形象。几年以后，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把马科斯比作尼克松，因他们俩人都喜欢玩弄政治诡计，都有变色龙的本领，似演什么角色都很在行。

我第一次到马尼拉时，罗慕洛将军警告我说：“这里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果然，这里确实不是没有阶级。西班牙的统治使菲律宾的封建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少数有地位的家族——也许占人口的10%——控制了全国的财富和权力。由于全国财富和权力被这一小部分人控制，尽管它的人口跟法国一样多，菲律宾就象一座小城似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或沾亲带故，闲言碎语成了众人喜爱的消遣。这些编造的、娓娓动听的闲话，时常也是可笑的。军事管制期间规定不准说闲话，否则就是犯罪，就要被监禁。即使这样，闲话仍然继续，丝毫未减——只是变成耳语而已。闲话议论的中心是伊梅尔达的挥霍无度及其“嗜好”。她无法容忍对她的批评或“坏消息”，因为她习惯于宠臣向她拍马献媚。他们则利用她达到自己的目的。

尽管我来马尼拉的前一年秋天，这里已经实施军事管制。但我搬来时，以及来后几年中，马科斯夫妇看来还得人心。人人都想受到宫里的邀请。有些家族的生意被马科斯的密友抢去了，或者家里有人被关进牢房了（例如小贝尼格诺·阿基诺），就牢骚满腹。有些富裕的妇人偶而攻击伊梅尔达，说她奢侈，但总统本人未受到攻击。总的来说，马尼拉在政治上还是个驯服的社会。

中产阶级少得微不足道，穷人数则大得可怕。据说美国人统治期间，曾教过菲律宾实行民主制度，搞了一个总统制政府、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司法机构，但其根基太浅。所以当费迪南德·马科斯为了确保自己权力，更改民主制度时，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反抗。

他废除了国会（许多人认为国会是个障碍，而不是一种立法手段），修改了宪法，从而使政府从两院制度为议会制。这样，法律能很快通过。不过马科斯还是通过总统法令来管理国家。他取消国会，使司法机构隶属于总统府以后，他就可以自由行动，不需要作任何说明，不受任何监督，也不考虑什么平衡。然而，他继续享有极大威望，仍是敬爱的“达图”。

总统口上讲“民主”，而真正相信的是他的个人统治。个人统治在亚洲并非绝无仅有。他一宣布军事管制后（这使他能随便接触所有监督和平衡机构），就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一一破坏这些机构。他取消了副总统，他不允许新闻界自由发表意见，谁说怪话就要判罪。他摧毁人身保护法，受害人有冤无处伸。

所有这些他都得手了，人民居然没有多大反抗。他悄悄

地吞食了人民所获得的一切，每次一汤匙，就象吃“十全大补膏”似的，还冠冕堂皇地盗用“国家进步”和“改组社会”的名义。他以必要的改组为由，把他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合情合理的。对这些菲律宾人大体上都接受了。每个人都认为，这个陈腐的封建秩序不能再存在了，也许费迪南德·马科斯正是能与过去决裂的领袖。他的“总计划”据说能解放菲律宾的内在活力和财富，建立“新社会”。他个人的政党就叫“新社会运动党”。该党最有魅力的明星和领袖就是他妻子——伊梅尔达。

费迪南德·马科斯和卡洛斯·罗慕洛都是在二次大战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不过二次大战时他们尚未相遇。

卡洛斯·罗慕洛（他比马科斯年长20岁）是个省长的儿子。美国总督帮助一批天资聪慧的菲律宾年轻人到国外去学习，他就是其中之一。1918年他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的保证人是校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到菲律宾，成为菲律宾大学英语教授，任报纸记者和编辑。

人们认为罗慕洛不关心政治，但他却为菲律宾每位总统效劳，通常是在国外任职。任何政党活动他都不积极参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夫人1935年来马尼拉时，他就跟他们交上朋友。麦克阿瑟是联邦政府的军事顾问，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麦克阿瑟被召回美国陆军服现役，指挥菲律宾的部队。那时他选中罗慕洛当他的副官和新军官，授予他少校军衔。罗慕洛那时是报纸出版商和预备役军官。

日本人进攻马尼拉时，麦克阿瑟夫妇、曼纽尔·奎琳总

统、罗慕洛以及其他逃到马尼拉湾河口的科雷希多尔岛。在菲律宾沦陷前，终于逃到澳大利亚（罗慕洛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书《撤离巴丹省的最后一个人》）。

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等待时机夺回菲律宾。他竭力使国内的美国人不要把太平洋战争置于脑后。美国及其盟国那时正集中精力于欧洲战争，麦克阿瑟设法获得物资和人员。他却想方设法提高处在沦陷区的菲律宾人民和游击队员的士气，把香烟、糖果、桔子空投到菲律宾的各个岛屿，每样东西上都写着“我一定回来。麦克阿瑟。”后来有人把麦克阿瑟这一做法说成是“利己主义”。罗慕洛每次听到这种言论都勃然大怒。

“麦克阿瑟将军本来要在这些物品上写‘美国不会不管你们’。但我劝他写成‘我一定回来’。因为菲律宾人了解麦克阿瑟，如果说他要回来，他们就会相信他能回来。”

麦克阿瑟将军的夫人琼·麦克阿瑟和卡洛斯·罗慕洛年龄相仿——比麦克阿瑟年轻20岁。战争年代罗慕洛与他们一直在一起，战后还继续是亲密无间的挚友。我们每年秋天都要去纽约。一到华道尔夫饭店，罗慕洛就订好鲜花送给琼，很快我们房里电话铃就响起来了：“罗米，你回来了！”

（他的美国朋友们总称他为“罗米”）。每次重逢都非常愉快。罗慕洛将军逝世第二天，琼·麦克阿瑟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感到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被夺走了。”她悲哀地说。

罗慕洛当过教师、作家，最后是国际级的外交家。他是第一个（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赢得普立兹新闻记者奖的亚洲人，以表彰他撰写的一系列预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文